

S D E U N I V E R S E S



SDE 学员专栏 · 之二

结构性脱钩：数字时代多社会形态 叠加下公共性的消解机制

公共性的危机，不是被压制，而是它的“发生条件”与“维持条件”发生了结构性脱钩。

张 琼 著

社会学博士 · SDE 学员

摘要

数字时代的公共性危机，并非公共领域被压制或侵占的历史重演，而是一种更深层的本体论断裂——公共性的“发生条件”与“维持条件”发生了结构性脱钩。本文提出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将这一脱钩机制解剖为三条不可互相还原的并行路径：时间脱钩，即公共性议题在即时性数字时间中被引爆，却需要线性或循环时间完成制度化沉淀，两种时间结构的错位切断了发生与维持之间的因果链条；空间脱钩，即公共性形态栖居于数字空间，但持续存在所需的信任累积和制度嵌入仍然依赖物理空间的沉淀机制，线上线下之间的本体论断层使公共性永远跨不过这道鸿沟；认知脱钩，即个体的认知系统被数字环境训练为高效的“发生机器”却无法同时胜任“维持机器”，认知开放性与认知稳定性在同一个大脑中构成矛盾。三种脱钩机制共同作用，导致多社会形态叠加条件下的公共性从标本形态退化为气泡形态，最终消解为粉末化的背景噪音。本文的核心贡献在于：（1）以“脱钩指数”为工具，将发生条件与维持条件之间的本体论关系转化为可被实证测度的操作框架；（2）建立四种脱钩后果——无根公共性、标本公共性、气泡公共性、粉末公共性——的分类谱系；（3）提出一个包含七项核心问题、六项独立研究项目的可生长研究纲领；（4）设置三条可被经验检测的3-5年时间窗口预测，为理论的证伪预留路径。本文的结论是：治理公共性危机的对象不是公共性本身，而是“发生-维持脱钩”这一结构性条件。这意味着公共性研究必须撤换其学科底座——以“连续性预设”为起点的修复逻辑，让位于以“脱钩诊断”为起点的重构逻辑。

关键词：公共性消解；发生-维持脱钩；多社会形态叠加；时间结构错位；认知双重性；脱钩指数

一、引言

公共性正在消失——这个判断在当代学术话语中几乎成为老生常谈。从哈贝马斯（Habermas, 1962/1989）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诊断，到近期关于社交媒体如何碎片化公共话语的实证研究（Sunstein, 2017; Tucker et al., 2018），学术界持续追踪着公共性的衰败轨迹。然而，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是：在所有这些诊断中，公共性的外部表征并未消失。热搜仍在更新，评论区仍在争吵，公共议题仍在“引爆”。一个经验事实的悖论由此浮现——我们同时见证了公共性的“消亡”与公共性表征的“饱和”。如何理解这个悖论，构成了本文的问题起点。

本文提出的核心命题是：数字时代多社会形态叠加条件下，公共性危机不是“被压制”或“被掏空”，而是其“发生条件”与“维持条件”发生了结构性脱钩。所谓“发生条件”，指的是公共性议题得以在公众视野中出现、凝结、被广泛注意所需要的土壤——包括注意力场域、合法性空间、个体的认知开放性。所谓“维持条件”，指的是公共性议题从出现到持续存在、从情绪触发到制度嵌入、从短期聚集到长期沉淀所需要的机制——包括制度化通道、信任累积、组织化承载。在工业化民主社会相对同质化的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中，这两个条件曾经是连续的：公共性一旦发生，通常会沿着一条可预期的路径进入维持轨道，工会、政党、媒体、议会等制度装置充当了发生与维持之间的因果桥梁。然而数字时代的多社会形态叠加——农业时间的循环、工业时间的线性、信息时间的瞬间性被数字平台同时激活并互相打断（Barnard, 2020; Wajcman, 2015）——使这个连续

性预设彻底失效。公共性在一种时间结构中诞生，却在另一种时间结构中衰老。二者之间的因果链条不是被削弱了，而是被切断了。

本文通过一个多视角的综合分析，将这一脱钩机制解剖为三条不可互相还原的并行路径：时间脱钩、空间脱钩、认知脱钩。三种脱钩各自沿着不同的机制运行，但共同指向同一个后果——公共性不是在“被摧毁”，而是在“被无法同时存在所消解”。三条脱钩路径构成了本文理论框架的核心。

本文的学术贡献体现在四个层面。第一，概念层面：提出“发生-维持脱钩”这一分析概念，将公共性研究的基础从“连续性预设”切换到“脱钩诊断”，为理解数字时代公共性的本体论断裂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第二，实证层面：设计“脱钩指数”操作框架，以发生条件健康度与维持条件健康度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作为脱钩程度的测量工具，使这一概念可以被经验研究检验。第三，分类层面：建立脱钩后果的四形态谱系——无根公共性、标本公共性、气泡公共性、粉末公共性——区分了脱钩程度不同所导致的异质性后果。第四，纲领层面：提出一个包含七项核心问题、六项独立研究项目的可生长研究纲领，并设置三条3-5年内可验证的时间窗口预测，为理论的自我校正预留路径。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节综述公共性理论的三个主要传统——公共领域理论、数字公共性批判、多时间尺度社会分析——指出各自的理论盲区，定位本文的突破点。第三节构建理论框架，系统阐述三种脱钩机制和四种后果谱系。第四节设计多元方法论，详细说明脱钩指数的操作化方案。第五节是核心的分析与讨论，完整展开三种脱钩路径的运行机制和四种后果的转化逻辑。第六节专门讨论可证伪性检验，设置排除竞争解释的研究设计。第七节总结理论贡献并勾勒研究纲领。全文以“脱钩”这一本体论命名为逻辑红线，贯穿概念建构、实证设计、谱系分类和纲领规划，试图为数字时代公共性研究提供一个可被质疑、可被实证、可被修正的整合性框架。

二、文献综述：公共性危机的三个解释传统及其盲区

理解公共性的当代困境，需要回溯三个互相竞争又彼此补充的理论传统。它们在各自的有效范围内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洞察，但也都受制于一个共同的预设——公共性的发生与维持被视为一个连续过程——因而无法充分解释数字时代特有的脱钩现象。

2.1 公共领域结构转型与连续性预设

哈贝马斯（Habermas, 1962/1989）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奠定了公共性研究的经典框架。在该框架中，公共领域被界定为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交往空间，私人在这一空间中对公共事务进行理性批判讨论，形成公共舆论，进而通过制度化的通道影响政治决策。哈贝马斯的核心诊断——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在19世纪末以来经历了“再封建化”，即大型商业媒体和利益集团的结构性权力侵蚀了理性批判讨论的条件——虽然针对的是大众媒体时代，但其分析结构对数字时代仍具有持久的参照价值。

然而，哈贝马斯框架中存在一个关键的预设：公共性的“发生”——即私人在公共空间聚集、讨论、形成舆论——与公共性的“维持”——即舆论通过制度化渠道被传导、累积、转化为政策——被视为同一个过程的两个阶段。俱乐部、沙龙、报刊、议会，这些制度装置天然地将讨论的发生引向维持。讨论一经发生，就被假定拥有一个朝向制度化、持续化、累积化的内在倾向。这个预设在今后的修正版本中也未被充分质疑。弗雷泽（Fraser, 1990）对“反公共领域”的论述扩展了公共领域的主体范围，揭示了被排斥群体如何创建替代性公共空间，但她的分析仍然保留了发生与维持的连续结构——反公共领域一旦“发生”，就具有了自我维持和扩展的潜力。同样，汤普森（Thompson, 1995）对“可见性”与公共性关系的分析引入了媒介化的维度，但仍然是“连续谱系”框架内的修正——可见性（发生）通过媒介的制度化运营被转化为公共性（维持）。

这种连续性预设的有效性依赖于一个历史条件：社会的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相对同质。在工业化民主社会中，公共讨论的节奏大致与印刷媒体和广播媒体的周期同步，空间的物理邻近性保证了讨论的组织化承载。当数字平台将多种时间结构（循环的、线性的、瞬间的）和空间结构（物理的、数字的、混合的）同时激活时，这个预设就崩塌了。本文的“时间脱钩”和“空间脱钩”分析，正是针对这个崩塌的后果。

2.2 数字公共性批判：碎片化、极化与注意力私有化

第二个传统聚焦于数字技术对公共性的冲击。桑斯坦（Sunstein, 2001; 2017）的回音室效应和极化理论揭示了个体在数字环境中倾向于接触与自身立场一致的信息，导致公共话语碎片化为互不交流的飞地。帕里泽（Pariser, 2011）的过滤泡概念指出算法推荐系统如何根据个体行为数据构建个性化的信息茧房。图夫克奇（Tufekci, 2017）分析了社交媒体如何使社会运动快速发生但难以持久——她的“滑行组织”概念已经触及了发生容易、维持困难的结构性问题，但未能将其抽象为一个独立于技术平台的、跨场景的本体论机制。扎勒（Zaller, 2021）对注意力经济和公共话语衰落的分析，揭示了注意力商品化如何系统性地侵蚀严肃公共讨论的空间。

这一传统的贡献在于精确描述了公共性在数字条件下的“发生机制异化”：注意力的碎片化、算法的过滤、极化对情绪的低成本调动。但其普遍的理论盲区在于：始终将分析锚定在“发生条件被侵蚀”这个层面，而默认维持条件——公共性一旦形成后的持续机制——要么未受根本损害，要么可以通过“修复发生土壤”被连带修复。当这种默认失效时——即发生条件坏掉了但维持条件仍在运行，或者反之——这个传统就失去了诊断力。

班尼特和菲尔舍（Bennett & Pfetsch, 2018）的“沟通逻辑的断裂”概念突破了这个传统的一些局限。他们指出，数字媒体环境中的公共沟通不再遵循传统民主理论预设的逻辑（理性、包容、面向共识），而是分裂为多种不可通约的沟通风格。但他们仍将这种断裂理解为一个阶段性的、可被修复的过程——通过重建沟通规范、改善媒体素养、改革平台监管。他们未能看到的是，这种断裂可能是本体论性质的——不是规范被违反了，而是“连续”这个条件本身不再具备。

2.3 多时间尺度社会分析：加速、去同步与社会节奏

第三个传统的冲击来自社会学和时间研究。罗莎（Rosa, 2005/2013）的社会加速理论揭示，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是技术加速、社会变迁加速和生活节奏加速三个层面的自我强化循环，导致个体与其所处结构之间的“去同步”（desynchronization）。在罗莎的分析中，去同步的后果是“情境认同”对“稳定认同”的替代——个体无法在快速变化的社交环境中维持连贯的自我叙事，这与本文的“认知脱钩”分析高度相关。但罗莎的分析止步于个体层面（异化感、倦怠、抑郁），未能将这个机制引向公共性的消解。本文的一个重要推进，就是将“去同步”从个体心理学议题转化为公共性本体论议题——去同步的不仅是个人时间与社会时间，更是公共性“发生”的时间结构与“维持”的时间结构。

泽鲁巴维尔（Zerubavel, 1981）对时间的社会组织的研究，揭示了不同社会群体如何依据不可见的时间节律组织其集体生活。马卡姆（Markham, 2020）将泽鲁巴维尔的框架扩展到数字环境，提出“时间多重性”（temporal multiplicity）的概念：在线环境中，多种时间节律（新闻周期、社交媒体的刷新周期、用户生命周期的衰减节奏、制度的决策周期）同时并存且各自吸引注意力。马卡姆的贡献在于指出了这些时间节律之间的不可通约性——它们不仅速度不同，而且“质”不同。新闻周期追求事实确认，社交媒体周期追求情绪反应，制度周期追求程序合规。同一议题在这三种时间结构中运行，被切割为不可拼合的信息碎片。但马卡姆未能将这些洞见系统地整合进一个公共性分析框架中——她的分析是描述性的现象学，而非因果机制的解剖。

豪尔（Hörning, Ahrens, & Gerhard, 1999）的“时间先锋”（time pioneers）研究则从微观层面揭示了当代社会中个体对时间控制的实践。他们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发展出非线性的、即兴的时间安排，打破了工业社会固定的时间节奏。这个洞察为本文的“认知脱钩”分析提供了经验基础：如果个体已经习惯了在多个时间结构中切换应对，那么“维持一个长期的、连贯的公共承诺”就不再是认知系统的默认设置，而成为一种需要额外努力才能维持的异常状态。

2.4 三种传统的汇聚与盲区：连续性预设的共同负担

这三个传统各自贡献了不可替代的洞察：公共领域理论提供了公共性“应当如何运转”的规范框架；数字公共性批判提供了“当代条件如何侵蚀发生条件”的经验地图；多时间尺度社会分析提供了“时间结构的异质性如何重构社会经验”的微观机制。但三个传统共享同一个盲区：它们都默认了公共性的发生与维持是一个连续谱系上的两个阶段，区别仅在于这个连续谱系在当代条件下是否运作顺畅。即便是罗莎的“去同步”和马卡姆的“时间多重性”这些直接逼近脱钩问题的概念，也未能将这种断裂正式命名为一个独立的本体论事实。

本文正是在这个盲区中切入。本文不否认上述三种传统的有效性——它们各自描述的机制（注意力碎片化、算法过滤、时间加速）确实在发生-维持脱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本文要指出的是，这些机制不是并行发生的独立现象，而是被三种脱钩路径——时间脱钩、空间脱钩、认知脱钩——整合进一个统一的因果结构。脱钩不是“碎片化+加速+极化”的简单加总，而是三者被组织为一个不可

逆的“本体论切断”。这个判断将本文与既有研究区别开来：既有研究问的是“公共性为什么正在衰败”，本文问的是“公共性为什么变成了一个无法同时发生和维持的东西”。

三、理论框架：三重脱钩机制与四形态后果谱系

基于上述文献审查的发现，本节构建一个整合性的分析框架。框架的核心是一个本体论命题：在多层次社会形态叠加的条件下，公共性的“发生条件”与“维持条件”发生了结构性脱钩，这种脱钩通过三条不可还原的路径运行，并产生四种程度不同的后果形态。

3.1 发生条件与维持条件的分析性区分

公共性的生命周期可以被分析性地切割为两个阶段。“发生”指公共性议题或形态首次出现并进入公众视野的过程。发生条件的构成要素包括：注意力场的开放性（一个议题需要足够多的人在同一时间窗口内注意到它）、合法性空间的可用性（一个议题需要被承认为“公共议题”而非私人抱怨）、个体认知系统的开放性（个体需要具备识别议题、形成立场、表达意愿的能力）、以及触发事件的供给（议题需要一个被感知为“值得讨论”的事件作为锚点）。在数字时代，平台算法、社交媒体、即时通讯工具成为了发生条件的主要供给者——它们决定了哪些议题能在什么时间、以什么速度、对哪些人群“发生”。

“维持”指公共性议题或形态在发生之后持续存在、深化发展、制度化的过程。维持条件的构成要素包括：制度化的承载通道（议题需要有组织、媒体、法律程序等稳定装置来保持其存在）、时间结构中的沉淀机制（议题需要跨越短期注意力周期、进入长期记忆和反复讨论的循环）、信任的累积（个体需要逐步建立对议题的真实性和讨论的持续性的信任）、以及集体的学习曲线（参与讨论的人需要在时间中深化理解、调整立场、形成共识或清晰的歧见）。在工业化民主社会中，政党、工会、教会、学校、长期媒体机构曾是最主要的维持条件供给者。数字时代，这些传统供给者在衰退，而新的持续维持的装置尚未形成——平台算法不“维持”任何议题，它只“刷新”。

区分这两个条件的分析价值在于：它允许我们诊断一个公共性形态的危机，究竟出在“它无法发生”还是“发生了但无法持续”。更重要的是，它允许我们诊断这两种能力是否正在分离——发生能力完好无损甚至增强，而维持能力持续衰退。这正是本文所要描述的“脱钩”状态。

3.2 时间脱钩：多时间结构错位中的因果切断

时间脱钩发生的过程如下。在数字平台的推动下，公共性议题的发生被锁定在“即时时间”中。即时时间的特征是没有持续性——一个热搜的生命周期以小时计，在一个时间窗口内引爆公共注意力之后，它迅速被下一个热搜取代。这种发生能力非常高效：平台算法可以在数小时内将地方性事件转化为全国甚至全球性议题。但问题在于，议题的维持——即它被深入讨论、反复追问、逐步制度化——需要完全不同的时间结构：要么是工业社会的线性时间（按步骤推进的调查、立法、谈判、组织化），要么是前现代社会循环时间中的重复仪式、节律化纪念和代际传递。

在多社会形态叠加条件下，这两种时间结构被数字平台同时激活却又互相打断。一个公共性议题在即时时间中爆发——例如某事件在一小时内获得数千万次点击和数百万条评论——但线性时间中的回应机制（调查程序、问责流程、制度修订）需要数月甚至数年才能完成。当这个过程进行到一半时，即时时间中的注意力场已经彻底刷新，支持这个议题发生的能量场已经不复存在。议题的维持因而失去了来自发生的驱动力——它不是被“压制”了，而是被“遗忘”了，因为在即时时间的运行逻辑中，它的“发生时限”到了。与此同时，循环时间中的仪式化维持——例如每年特定日期的纪念活动——因为被即时时间不断打断而无法建立稳定的节律。

这种多时间结构错位导致的结果，不是发生条件或维持条件各自出现了技术性故障，而是它们之间的因果链条被时间结构本身切断。发生的成功不再为维持输送能量；维持的努力也不再能回溯到发生的起点去寻找动力。一个公共性议题在发生时就已经与其未来的维持条件脱离了关系——它们在两种彼此独立运行的时间流中被冲刷。

3.3 空间脱钩：数字空间与物理空间之间的本体论断层

空间脱钩的机制与时间脱钩并行但独立运行。公共性议题的发生越来越栖居于纯粹的数字空间：社交媒体平台、即时通讯群组、在线论坛、视频分享网站。在数字空间中，公共性发生的成本极低——不需要物理聚集、不需要场地、不需要组织许可，表达本身就是聚集。这使公共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生便利性：任何人、在任何地点、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引发公共讨论。

然而，公共性的维持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物理空间的沉淀机制。信任的建立需要面对面互动中非语言信息的反复确认；组织的长期运作需要物理空间中的资源集中（办公室、档案、资金管理）；制度化需要物理节点上的持久存在（在政府大楼、法院、立法机构中被看见和记录）。这不是说这些过程不能转移到线上，而是说在线上的纯粹形态中，信任由算法排序替代，组织由瞬时协调替代，制度化由数字签名替代——这些替代物在功能上类似，但在本体论上是另一种存在：它们不具备物理空间中的耐久性、不可篡改性和强制约束力。

当发生被锁定在数字空间而维持需要物理空间时，两者之间出现了一道本体论断层。公共性议题在数字空间中被热潮冲上顶点，然后试图跨越这道断层进入物理空间的维持过程——组织化、制度化、持久化。但跨越的过程本身就是一次能量损耗。大多数议题在跨越中断掉：它们作为数字发生是成功的，但作为物理维持从未真正开始。少数议题确实跨越了——例如从在线倡议转化为持续的线下组织——但它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失去了数字空间中的发生优势：一旦开始作为物理实体运作，它们就进入了物理空间的时间节奏（缓慢、线性、资源密集），无法再与数字空间中的即时发生保持同步。公共性因此变成了一个在两个空间之间疲于奔命的存在——在数字空间中发生，在物理空间中维持，但两个空间没有可靠的桥梁，只有一次性的、高耗损的跨越尝试。

3.4 认知脱钩：认知系统的双重性与自我消耗

认知脱钩是最微观但也许是最根本的脱钩路径。它发生在每一个数字公民的认知系统内部。在多时间结构、多空间存在的数字环境中，个体的认知系统接受了两种互相矛盾的训练。

第一种训练是“发生能力”。数字平台奖励快速反应：在信息流中迅速识别一条可引发情绪反应的内容，立即点赞、评论、转发，然后立即刷新。这种训练优化的是认知的开放度、刺激敏感度和情感爆发力。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中，个体的认知系统变得极擅长“被触发”——一个公共性议题可以在几秒钟内引发强烈且可表达的反应。但这套训练同时抑制了认知的另一种能力：“维持能力”。维持一个公共性议题需要的是持续关注、延迟判断、容忍信息不完整、有耐心等待事态发展、有毅力在失望后重新投入。这些认知品质与发生能力所要求的快速、省力、情感驱动恰恰相反。

第二种训练是“身份切换”。在多形态社会空间中，个体在家庭、工作、娱乐、政治参与等不同场景中启动不同的身份模块。数字平台使这种切换变得更频繁也更容易——几秒钟之内，一个人可以从一个严肃的公共讨论群组切换到娱乐短视频的消费状态。长此以往，“切换”从一种临时策略固化为认知系统的默认设置。个体不再期待自己在不同场景中保持一个连贯的、负责任的公共身份——因为默认设置是“我会在下一秒变成另一个我”。这种默认设置使得维持一个长期的公共承诺变得极其困难：不是缺乏意愿，而是缺乏一个在不切换状态下持续存在的“自我”来承担这种承诺。

认知脱钩的结果是：个体的认知系统被训练为一台高效的“发生机器”和一台不合格的“维持机器”的并存。同一个人可以在一周内作为公共性议题的发起者表现出色——在社交媒体上迅速动员大量关注，然后在同一个议题的维持阶段完全缺席——不是出于冷漠，而是因为维持所需的认知资源已经被发生阶段的训练消耗殆尽，或者因为身份切换的惯性使得“那个发起者的我”不再存在于当前时刻。这种脱钩发生在个体认知系统的内部，但它以数以亿计的规模复制——这不是“有些人负责发生，有些人负责维持”的社会分工，而是“同一个人的发生能力与维持能力在认知层面被撕裂”的普遍状态。

3.5 脱钩后果的四形态谱系

三种脱钩路径的组合产生了脱钩程度不同的四种后果形态。它们不是时间序列上的演化阶段，而是在不同社会形态组合下可能并存的几种模态。

无根公共性是脱钩程度最轻微的一种形态。其特征是：发生条件已经被侵蚀（注意力碎片化导致议题难以凝结），但维持条件仍然部分存在（既有制度装置仍能承载已发生的公共性）。这就像一个土地正在退化但植被仍靠存量的土壤肥力存活的生态。无根公共性的特征是：新的公共性难以发生（因为注意力被私有化和碎片化），但已经存在的公共性形态（既有社会组织、媒体机构、公民团体）仍能依靠惯性维持运转。这是一种“消耗存量、无法增量”的状态。

标本公共性是脱钩中度的形态。其特征是：发生条件已经坏掉（注意力被彻底私有化，合法性被割据），维持条件仍在运行但被替换了——制度通道不再服务于公共性功能，而服务于平台逻辑。标本公共性的外部形态高度完整——热搜仍然在更新，评论区仍然在运作，公共舆论的字面形式仍然存在——但内部功能已经被替换：议程设置变成了流量收割，反思变成了确认偏差增强，整合变成了泡沫共存。它像生物学的化石标本：形态被完整保留，但生命功能已经丧失，且过程不可逆。

气泡公共性是脱钩重度的形态。其特征是：发生条件在不同社会形态之间彻底碎片化，维持路径各自闭合。公共性不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而是裂解为多个内部功能完整、边界明确、自洽但彼此不可见且不感兴趣的“公共性小宇宙”。每个气泡有自己的信息链、规范体系、情绪共振机制和合法性主张，但气泡之间没有可通约的对话界面。这不是意见分歧——分歧的前提是看同一个问题——气泡是根本不在看同一个问题。气泡内部是活的，整体是死的。

粉末公共性是脱钩极度的形态。其特征是：气泡本身也在持续退化的差异路径中不断剥落碎片，碎片不再凝聚为任何新的形态，而是悬浮为弥漫的、无边界、无连续、无对象、无主体的“粉末”。粉末公共性的五个不可还原特征：无边界性（碎片不聚合成任何可识别的群体）、无连续性（每条碎片在被刷新后永远不会再相遇）、无对象性（表达不“关于”任何东西，表达本身成为唯一内容）、无主体性（没有持续存在的表达者位置）、无形变能力（粉末永远不会凝固为任何结构）。这不是碎片化——碎片化预设了碎片有可识别的边界和可被拼接的潜力——粉末化意味着公共性从“可被压迫”这个范畴中彻底消失。

这四种形态共享同一个根因——发生-维持脱钩——但在脱钩程度、路径组合、社会形态差异上有所不同。理解这个谱系，有助于避免把公共性的多样退化统称为“衰落”而失去差异化的诊断力和针对性的治理可能。

四、方法论：脱钩的操作化与多元研究设计

将上述理论框架转化为可被实证检验的工具，需要系统的方法设计。本节提出一个混合方法的研究策略，包含三种各自可独立操作但又互相咬合的方法路径。

4.1 脱钩指数：以相关性测度脱钩程度

脱钩的概念核心是“发生条件与维持条件之间因果关系的切断”。操作化这一判断的最直接路径，就是将脱钩定义为一个经验相关性：当一个社会的公共性发生条件与维持条件之间的统计相关性持续显著下降时，我们就说脱钩正在发生。脱钩程度可以操作化为“发生条件健康度”（HS）与“维持条件健康度”（HM）之间的皮尔逊相关系数的下降幅度。

发生条件健康度（HS）可以通过以下指标合成：（1）新公共性形态的年发生率——这一年中出现了多少个全新的、能持续至少一周的公共性议题或组织；（2）跨群体议题凝结率——不同社会群体在社交媒体上同时关注同一议题的频次与持续性；（3）公共空间可进入性——一个非精英的普通人引发广泛公共讨论的难度（以弱势群体发声被主流媒体引用的比例测量）。

维持条件健康度（HM）可以通过以下指标合成：（1）既有公共性形态的持续活跃度——已存在一年以上的公共组织、媒体或公民团体的存续率与活跃度；（2）议题的制度嵌入度——从公众议题转化为立法或政策改变的完成率与周期；（3）反思的深度累积——在持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共讨论中，参与者的立场调整、认知深化、共识形成的平均程度。

HS和HM各自作为独立指标被测量的每一年，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可以通过皮尔逊相关系数计算。脱钩的诊断标准是：如果HS和HM的相关系数在五年观察窗口内从强相关（ $r > 0.7$ ）降为弱相关或不

相关 ($r < 0.3$)，就可以诊断脱钩发生。这个设计同时回答了“脱钩到底是暂时的波动还是结构性的切断”——只有持续的下降趋势才能支撑后者。

脱钩指数的一个操作难点是，HS和HM可能共享某些混杂变量——例如一个社会的总体政治稳定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这些变量可能同时影响发生和维持条件，导致HS和HM之间看似无关但实际受到共同因素驱动。排除这种干扰的方法是将总体变量作为控制变量纳入多元回归，观察HS和HM在控制总体变量后的偏相关系数。如果脱钩偏相关系数仍然持续下降，就可更确信脱钩是独立于外部总体条件的结构变化。

4.2 维持条件衰竭的追踪：平台算法变更的自然实验

三种脱钩路径共享的一个后果，是既有公共性形态的“维持条件”被替换——从自组织的、制度化的维持，转变为依赖平台算法推荐等外部供给的维持。这制造了一个可被实证捕获的自然实验窗口：当平台算法发生变更时，高度依赖该算法的公共性形态将面临维持条件的突然中断；而那些不依赖或低依赖该算法的形态则受影响较小。通过比较这两类形态在算法变更前后的存续率和功能完整性，就可以验证“维持条件的替代性供给是否具有内在脆弱性”这一命题。

研究设计的步骤如下。第一步，选择一个在3-5年观察窗口内发生了可被公开记录的主要社交媒体平台算法变更案例（例如，某平台调整推荐逻辑，或改变信息流的排序机制）。第二步，在变更发生前，建立一个包含多种公共性形态的样本池——包括高度依赖平台推荐获取关注度的形态、中度依赖的形态、低依赖的形态（依赖程度可以通过该形态在过去一年内以平台推荐为最主要流量来源的比例来测量）。第三步，在算法变更发生后的6-12个月，追踪这些形态的存续率（是否持续发布、用户互动量变化）和功能完整性（是否仍保有议程设置、反思、整合功能，还是沦为纯粹的情绪表达）。第四步，通过差分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s）比较高依赖组与低依赖组在变更前后的差异。本研究的核心假设是：高依赖组的存续率和功能完整性将出现显著的大幅下滑，且下滑不可逆——即使平台此后恢复旧算法，被中断的形态已失去累积的信任和参与惯性，无法重新启动。

这个自然实验设计同时具有方法论上的双重价值。它在实证上为“维持条件替代的不稳定性”提供了因果证据。在理论上，它提供了反驳“公共性可以自然地适应平台环境”这一竞争解释的证伪入口——如果高依赖组在下滑后又恢复，说明维持条件替代并非结构性困境，公共性有自我修复能力；如果高依赖组永久衰退，就支持“维持条件一旦被替换就无法再生的不可逆命题”。

4.3 反脱钩微观生成机制：极端案例追踪与可行性条件识别

前两种方法测量脱钩的程度和后果，第三种方法则追问“脱钩是否绝对”——是否存在成功逆转或阻止脱钩的微观实践？如果存在，这些“反脱钩”实践在什么条件下是可行的？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在多个社会形态叠加的场域中追踪可被识别为“试图克服发生-维持脱钩”的个案，观察它们的策略、过程和结果，从中提取可被复制的机制。

案例选择的标准是：（1）该实践试图在一个数字平台上引发的公共性议题中，将其从即时发生阶段推进到持续维持阶段（至少六个月以上的连续运营）；（2）该实践不只是传统组织使用数字工具，

而是明确意识到“发生与维持之间的结构性断裂”并设计了专门策略来跨越它；（3）该实践在资源、政治环境、技术条件上不具有极端特殊性，具有可被比较的可能。

选择成功和失败两类案例进行对比追踪。成功的案例中，预期可以观察到以下机制之一或组合：

（1）“双栖行动者”——核心组织者能够同时在数字空间的即时时间和物理空间的线性时间中运作，充当两个时间结构之间的翻译器和缓冲器；（2）“危机窗口利用”——在维持条件面临崩塌的临界时刻，组织者主动改变了议题的形式或平台依赖，将注意力场的迁移引导向维持通道而非流失；（3）“可译码性建设”——创造了一种“简约标记”（如特有符号、视觉标识或口号），使得该议题在数字空间中每次被碎片化刷新后，仍可被迅速识别并重新连接回整体叙事。失败案例则缺乏这些机制或其应用失败。

这个微观生成机制追踪的目的，不是证明“反脱钩是可能的”从而撤回整体诊断，而是识别出在什么条件下反脱钩可行，从而为干预设计提供工程基础。它同时也为整体命题提供了证伪路径——如果在所有追踪案例中都找不到任何成功的反脱钩机制，则“脱钩不可逆”的强判断就获得了更高的可信度；如果某些条件机制被证明可推广，则“脱钩不可逆”需要被修正为“脱钩在常规条件下不可逆，但特定机制可局部逆转”。

五、分析与讨论

本节是论文的核心。前三节分别提出了脱钩命题、建构了理论框架、设计了实证方法，本节将三种脱钩路径的运行机制和四种后果形态的转化逻辑展开为系统分析。

5.1 时间脱钩的运行机制与后果层积

时间脱钩的本质，是数字平台将公共性发生锚定在即时时间中，而维持却被留在线性时间或循环时间中，两种时间结构之间缺乏可靠的因果桥梁。这一机制的运行，可以分解为三个连续的步骤。

第一步是“发生的即时化锁定”。平台算法的推荐逻辑基于新鲜度——最新发布、最快速传播、最强烈刺激的内容被赋予最高权重。公共性议题要想“发生”，就必须适应这个逻辑：它必须在极短的时间窗口内引爆足够的情绪反应、点赞和转发。这迫使议题的表达方式趋向于简化、情感化、对错分明——因为只有这样的表达可以在秒级内被处理并产生反应。这同时意味着，任何需要延迟判断、需要耐心听完双方陈述、需要容忍不确定性的复杂议题，在即时时间的发生通道中都会遭受系统性劣势。发生的成功，依赖于议题迎合即时时间的逻辑；而这种迎合本身，就已经削弱了议题后续维持所需的信息厚度和反思空间。

第二步是“维持的时间结构悬置”。一个议题在即时时间中成功发生后，舆论压力原则上应该推动线性的制度化回应——调查、追责、立法、组织化。但这些过程有固定的时间节奏：证据收集需要几周，法律程序需要几个月，政策制定需要几年。当这些过程缓慢推进时，即时时间中的注意力场已经完成了数十轮刷新，新议题不断涌入并覆盖旧议题的可见性。旧议题的维持因此失去了来自发生的能量输入——没有人再讨论它，没有人再关注它的制度化进展，没有人记得当初为什么愤怒。制度化过程悬置在没有公共注意力注入的真空中，被无限拖延或无声消亡。

第三步是“时间结构的层积效应”。长期运行的时间脱钩，会在社会的时间经验中积累层层“半截议题”——曾经引爆舆论但未完成制度化的遗留物。这些半截议题不被正式记录为历史，但也不被完全遗忘，它们堆积在社会的记忆间隙中，以一种未被消化但已失去能量的方式持续存在。当新的类似议题发生时，它们不是从零开始，而是被叠加在这些半截议题的层积物上方——它们被感知为“又来一次”，而不是“一次新的发生”。这种层积效应腐蚀了公共性发生的初始动力——公众对议题的真实性和可被解决的可能性越来越不信任，因为他们无意识地背负着太多未被兑现的制度化承诺。发生-维持脱钩因此不是一次性的结构错位，而是在每一次循环中再现并加深的历史层积。

5.2 空间脱钩的运行机制与跨越成本

空间脱钩的机制核心，不在于数字空间无法承载公共性——事实上，数字空间可以非常高效地承载公共性“发生”——而在于数字空间中发生的公共性想要进入维持轨道时，必须跨越一道物理空间的**本体论断层**。跨越的成本异常高昂，且不可被数字化替代所消除。

这道断层的本质是什么？不是设施差异（线下有会议室，线上有视频会议），而是公共性维持所需的“沉淀”在本体论上依赖于物理空间。沉淀指的是信息在时间中不会被立即刷新、信任在反复互动中不会被一键删除、承诺在物理在场中被记录且无法撤回。在线下空间中，会议记录存在于物理档案中，不可被算法瞬间调换排序；矛盾被面对面地经历，不可被“静音”或“拉黑”一劳永逸地处理；承诺一旦被在场的人见证，就具有一种道德约束力——不是因为法律惩罚，而是因为“我会再次遇见这些人”。物理空间的在场性——身体的在场、空间的同时占有、再次相遇的不可回避性——为公共性的维持提供了一个不可被数字模拟的约束层。

当公共性从数字空间的发生跨越到物理空间的维持时，它遭遇的是这两套约束逻辑之间的本体论失配。在线发生阶段，公共性是轻盈的——它由可被无限复制且零边际成本的信息构成，由不被物理约束的注意力驱动。一旦试图进入线下的组织化维持，这种轻盈立即成为负担——留下物理档案需要场地和劳动，建立面对面信任需要时间和精力，承诺的道德约束力因为可以被“离开这个社群”而稀释。大多数从数字空间发端的公共性形态，在这个跨越点上被筛选掉——不是内容不好，而是物质基础撑不起。少数成功的跨越者，通常做了大量的组织基础建设工作——建立实体空间、凝聚核心成员、积累物质资源——这些工作本质上是在物理空间中重新为公共性“造一个身体”，其成本是数字发生的数百倍。这个成本差形成了空间脱钩的过滤效应——公共性发生的入口是低成本的，因而数量庞大；公共性维持的入口是高成本的，因而只有极少数能跨过。发生与维持之间的数量比，构成了空间脱钩的经验度量。

更进一步，即使某些公共性形态成功跨越并建立了线下的实体基础，它们也因此付出了失去数字发生优势的代价。一个拥有实体组织的公共性，其运行必须遵循线性时间的节奏——季度会议、年度预算、内部程序。它无法再像纯粹的数字发生那样，以分钟为单位响应事件。当新的同类议题在数字空间中再次被引爆时，这个已经实体化的组织通常来不及反应——它的时间节奏是维持的节奏，不是发生的节奏。它因此在数字发生的新浪潮前失去了主动性，被迫成为旧议题的守成者，而不是新动向的引领者。跨越的成功，恰恰导致它被锁定在物理空间的维持轨道中，与数字空间的发生轨道再次脱钩——只是这次是从另一端被切断。

5.3 认知脱钩的运行机制与自我系统性消耗

在三种脱钩路径中，认知脱钩最不被注意，但却可能是最深层的——因为它不是发生在制度或技术的外部结构中，而是发生在每个参与公共性的个体内部，在认知系统的锻造层面。

第一个锻造机制是“注意力刷新训练”。数字平台对个体认知系统的需求，不是“深”，而是“快”。每一次刷新都相当于一个微型奖励——新颖的内容、意外的信息、立即的情绪回应。经过数万次这样的循环，认知系统会优化出一个默认路径：注意力被优先分配给“可被快速处理并产生即时回应的刺激”，而对那些“需要延迟处理、需要保持未决定状态、需要在几天后再回来继续思考”的刺激，认知系统会分配“较低的优先级”并倾向于在刷新中被遗忘。这个默认路径对公共性的影响是双向的。在发生层面，这套训练制造了“高效的发生者”——人们非常擅长在几秒内对一个公共事件做出情绪反应并传播。但在维持层面，这同一套训练系统性地削弱了维持所需的认知资源——持续地关注一个不新颖的事物、在不确定中保持投入、在情感冲动后退却后依然保持理性参与。

第二个锻造机制是“身份切换的常态化”。多形态社会要求个体在多种社会角色之间频繁切换，而数字平台通过多账户、多社群、多信息流的架构使这种切换变得无缝且高频。在一个小时之内，同一个人可以作为严谨的专业人士浏览工作信息，作为逗趣的社交达人在朋友圈发布内容，作为愤怒的公民在公共议题下争论，作为消遣的观众消费娱乐内容。四种状态激活的是不同的身份模块，调用不同的认知资源，触发不同的情绪模式。长此以往，“存在一个跨越这些场景的、负责任的核心自我”这个预设被消解了。不是被人故意否定，而是在切换的频率中被超越了——核心自我需要连续性来维持，而切换本身作为默认设置剥夺了连续性。对于公共性而言，这意味着个体作为一个持续的公共行动者的位置被瓦解了。没有一个人“不关心公共事务”——在“愤怒公民”那个身份模块被激活的时间段里，个体非常投入——但这个身份只是一天数十次切换中的一个临时状态，它在下一次切换时就被其他身份覆盖了。公共承诺因此不是被放弃，而是被“切换”这个认知惯习本身消解为瞬时状态，无法跨时间持续。

两者的联合效应是“认知资源的自我消耗”。注意力刷新训练消耗了将认知资源分配给同一事务进行深度处理的能力；身份切换常态化消耗了将自我定位为同一持续行动者的可能性。这两种消耗不是加法关系而是乘数效应——当个体既没有能力保持注意力的持续分配，又没有能力保持自我的持续在场时，维持一个公共性议题所需要的“一个持续关注、持续思考、持续行动的个体”就失去了心理存在的基础。这不是个体的道德失败或认知缺陷，而是在当前数字环境的认知锻造过程中，维持公共性所需要的认知资源被系统性耗竭。

5.4 四形态转化的阈值条件

三种脱钩路径不是独立运行的平行机制，它们在不同的社会形态组合中相互作用，并因脱钩程度的不同而产生四种后果形态的转化。

转化的核心变量是“脱钩程度”，可以操作化为两个维度：“发生条件的侵蚀速度”与“维持条件的自持程度”。当二者都比较高时，即发生条件在被侵蚀但仍能产出新公共性、维持条件仍然强健

——这大致对应工业化民主社会后期的状况，后果形态倾向于无根公共性：新的公共性在萎缩，但已有的公共性仍被现有的维持装置承载运行。

当“发生条件的侵蚀速度”加快——特别是当平台算法彻底重构注意力场，发生被流量逻辑全面俘获——而“维持条件的自持程度”仍暂时存在但内容被逐步替换时，后果形态滑入标本公共性。这是R2诊断的状态：公共性面孔齐全但功能丧失。

当维持条件本身开始碎片化——不同社会形态各自提供了自治的维持路径，但这些路径不兼容——后果形态就进入气泡公共性。这要求“维持条件的自持程度”降低到一个阈值以下：既有的维持装置无法在整体社会层面运作，只能降级为局部维护。气泡公共性是标本公共性维持条件碎片化的直接后果。

当气泡内部的维持路径也持续失效——信息极度过载使气泡内部不再能维持连续注意力、成员在气泡间流动造成身份磨损、算法离心力持续撕扯——气泡本身剥落为更微小的碎片且碎片不再凝聚，后果形态进入粉末公共性。这个转化可以看作脱钩从“发生与维持的断裂”升级为“维持在其内部也在自我解构”——不只是公共性整体无法维持，而是每一个试图维持的局部也维持不了自身。

转化不是必然经历的序列，而是脱钩程度在不同社会形态组合下的差异化表现。在一个政治体制强势介入数字基础设施的权威主义社会，气泡化可能被部分延缓——因为在外部压力下气泡可能被迫保持某种表面的可被控制的统一——但这并不意味着脱钩没有发生，只意味着它的最终形态被强制手段推迟。在一个市场逻辑完全占据主导的社会，粉末化可能来得更快更彻底——因为没有任何外部力量有动机阻止它。这些是研究纲领未来需要精细追踪的跨场景比较。

六、可证伪性检验：排除竞争解释的研究设计

本节直接回应本文理论可能面对的最强竞争解释，并设计可操作的研究方案来排除它。一个理论如果没有清晰的被证伪的路径，其学术价值就极为有限。

6.1 最强竞争解释：策略性撤退而非结构性脱钩

本文的脱钩理论面临的最强竞争解释——即那个“其实不就是X吗”的最真实挑战——可以表述为：本文所描述的“公共性发生与维持的脱钩”，其实质不是结构性的本体论断裂，而是公共行动者在当前政治-经济条件下的策略性撤退。当压抑性的政治环境、不平等的经济结构和垄断性的平台权力使得长期公共承诺的成本过高、风险过大，理性行动者选择将精力投入到短暂、低成本、低风险的“发生”中，而策略性地放弃“维持”。这不是维持能力的消失，而是维持意愿的策略性压低。如果这个竞争解释成立，那么公共性的危机就不是结构性的“脱钩”——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无法同时发生和维持”——而是情境性的“策略选择”——条件改变，行为模式就会改变。相应地，干预策略就不同：不是去“重新耦合”发生与维持，而是去改变压抑条件，使维持不再是高风险行为。

这个竞争解释是有力的，因为它不需要引入任何“本体论断裂”这样的深层概念，仅靠经典的理性选择理论和对压抑性政治经济结构的经验描述，就能解释同样的现象。本文要成立，必须能够证

明：即使控制掉策略性撤退的动机和条件，发生-维持的断裂仍然存在且不可被回到“有策略性但不压抑”的环境所修复。也就是说，必须证明脱钩在“公平、可预期、低风险”的制度环境中也会发生且不可逆。

6.2 排除竞争解释的研究设计：比较案例与制度压力测试

排除这个竞争解释的核心，是寻找或构造这样一个研究场景：一个制度环境相对优良、政治压抑低、行动成本可预期的社会，或者某个大型平台中一个被设计为“低风险公共参与”的试验性空间——在这个环境中，如果策略性撤退是唯一原因，我们应该观察到发生与维持之间没有结构性脱钩，人们仍然愿意维持长期的公共承诺。如果脱钩仍然出现，且其模式与高压环境下的脱钩在结构特征上同构，这就构成对“策略性撤退”竞争解释的强力驳斥。

研究设计可以两层递进。第一层是比较案例研究。选取两个政治体制和制度环境高度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一个是典型的权威主义且对公共表达有明确压制措施的社会，另一个是典型的自由民主且对公共参与有强力制度保障的社会。在两个案例中分别构造五年窗口的脱钩指数，比较它们在各项特征上的差异。同时，构造策略性撤退的操作化指标——例如“个体表示因恐惧或成本而减少公共参与的调查比例”、“行动者明确将策略性退出作为公共声明内容的事件比例”。如果自由民主社会的策略性撤退指标显著低于权威主义社会，但其脱钩指数仍在持续上升且脱钩模式类似，这就支持了“脱钩独立于策略性撤退”的判断。如果反过来，自由民主社会的脱钩指数在策略性撤退指标很低的时候就停止了上升，那就支持了竞争解释。

第二层是制度压力测试。在一个被认为制度环境相对优良的社会中，有意推动一个具体的“低风险长期公共参与”试验性项目——可以是一个被法律保障且资源支持的社区公共讨论平台，所有参与者在该平台中的表达受到明确的法律保护，组织化行为受到明确的制度鼓励。如果策略性撤退是原因，该平台应该能成功地维系发生-维持的连续性——人们在其中发生议题，并愿意持续参与和推动其制度化。如果在降低风险和成本之后，脱钩仍然出现——参与者仍然倾向于快速发生新议题而忽略旧议题的持续维护，注意力仍被切换到下一个话题，信任和承诺仍流失——则证明结构性的认知脱钩和时间脱钩在独立运作，不受策略环境改善的影响。

6.3 什么结果会推翻本文理论

在上述两层设计下，以下是严格的可证伪条件：

如果第一层的比较案例研究发现，两个社会的脱钩指数走势与策略性撤退指标高度相关——即策略性撤退指标高的社会脱钩也高，策略性撤退指标不高的社会脱钩就不显著——那么本文的脱钩命题就需要被大幅弱化，甚至被撤回。它将被修正为“发生-维持脱钩是特定政治压抑条件的后果，而非数字时代公共性的普遍结构特征”。干涉方向将相应地从“重新耦合的设计”转向“改变压抑条件的行动”。

如果第二层的制度压力测试发现，在一个低风险、有制度支持、有资源保障的试验性空间中，发生-维持的脱钩可以被有效逆转——即人们在其中能够自然地同时充当发生者和维持者，议题可以从首

次爆发成功过渡到持续关注和制度化推动——那么本文的“认知脱钩”和“时间脱钩”作为独立于政治条件的结构机制这个判断就需要被大大修正。它将表明，结构断裂的根因确实在于外部压抑条件，人的认知系统本身并没有被数字环境不可逆转地重塑，只要给出安全的空间，维持公共性的能力是可复活的。

只有在同时面对这两种压力测试时仍被证伪失败——即自由民主社会的脱钩仍在发生且不可逆转，低风险空间中的脱钩也持续出现——本文的“三重脱钩”理论才真正获得了针对最强竞争解释的经验强度。

七、结论：理论贡献、研究纲领与未来方向

本文的核心命题——数字时代多社会形态叠加导致公共性的发生条件与维持条件发生结构性脱钩——在理论层面提出了以下贡献。第一，它识别了公共性危机中一个被既有理论系统性忽视的维度：不是压制，不是掏空，而是“发生和维持被切割成两个不可通约的过程”。这个识别超越了公共领域理论、数字公共性批判和时间社会学的各自局限，将它们分散的洞见整合进一个统一的因果框架。第二，它解剖了脱钩的三条并行路径——时间脱钩、空间脱钩、认知脱钩——使“脱钩”从一个笼统的隐喻变成可被分别操作化和分别追踪的因果机制。第三，它建立了一个脱钩后果的四形态谱系，使得公共性退化不再被笼统地归为“衰落”而失去差异化的诊断力和有望的干预点。第四，它给出了一个可被经验研究直接取用的方法论工具箱——脱钩指数、平台自然实验设计、反脱钩微观生成机制追踪——从而使理论具有清晰的被证伪路径和生长的实证基础。

基于上述贡献，本文为未来的公共性研究勾勒出一个可生长的研究纲领。该纲领包含七个核心问题、六项独立研究项目，可以在5-10年内持续产出知识。

核心问题群：脱钩在不同社会形态组合下如何被测量？四种后果形态之间的转化阈值如何被经验识别？脱钩中的因果机制究竟是什么——到底是时间结构错位、空间断层还是认知耗竭在起主导作用？脱钩后果为什么会在不同政治经济体制下呈现不同特征？维持条件是否有一个内部的承受极限，超过它就会全面崩塌？是否存在能够成功逆转脱钩的实践，它们的可行条件是什么？脱钩的利益分配——谁从脱钩中获益，谁承担最大成本？

六项独立研究项目：一项全球脱钩指数项目，在10个以上国家的五年窗口中系统追踪发生条件与维持条件相关性的变化趋势；一项平台算法变更的自然实验项目，在某个大型平台的算法变动节点上追踪不同依赖程度的公共性形态的衰退轨迹；一项反脱钩极端案例比较项目，系统收集和追踪全球范围内试图跨越发生-维持脱钩的小规模实践；一项不同政治经济体制的脱钩模式比较，比较权威主义国家、市场民主国家、后殖民混合制国家的脱钩特征差异；一项认知脱钩神经与行为实验，使用实验室方法检验长期数字环境暴露是否改变了个体对延迟回报和即时刺激的认知偏好；一项反脱钩教育干预实验，设计并随机对照测试训练个体“维持能力”的教育方案的效果。

这个研究纲领的共同本体论底座是“发生-维持脱钩”这一核心判断，它承担了纲领内不同项目之间的概念整合功能。测度脱钩（项目一和二）、识别反脱钩机制（项目三）、解释不同制度下的差异（项目四）、从认知层面验证机制（项目五）、从工程层面设计干预（项目六），构成了从诊断到

解释到干预的知识生产链。纲领同时也具有自反性：每一个项目都预设了可被该项目的发现撤回、修正或限定的可能。如果项目三发现了可大规模复制的反脱钩机制，那么本文的“脱钩不可逆”强判断就需要被修正；如果项目五证明认知脱钩是可被短期训练逆转的，那么本文对认知层面的悲观预判就需要被撤下。纲领不是理论的防御墙，而是理论的被证伪路径集合。

未来研究的方向集中在三个仍在本文中未被充分处理的盲区。第一，权力的缺场。本文的三条脱钩路径分析，在机制层面缺少权力维度——谁在维持脱钩？脱钩对谁有利？平台公司、广告商、国家——这些行动者从公共性的发生-维持断裂中获得了什么，又付出了什么？未来研究需要为脱钩机制安装权力分析模块，揭示脱钩背后的利益结构和权力分配。第二，文明传统的时间感差异。本文对时间脱钩的分析默认了现代西方线性时间观。但在循环时间观或祖先时间观占主导的文明传统中，时间脱钩是否以不同方式被经历？轮回文化是否天然对“维持”赋予更高价值从而减缓脱钩？这需要跨文明的比较研究来校准本文判断的文明前提。第三，公共性的“剩余”。本文全篇的叙事围绕公共性退化展开。但这是否遮蔽了公共性作为人的基本能力——与他人一起关心同一件事的能力——的持续存在？这种能力可能只是找不到当前的数字形态载体，而不是消失了。找到这个“剩余”在哪里，如何被承载，是研究纲领第二阶段的任务——从病理学走向生命学。公共性可能从未离开，它只是被剥夺了数字存在形式。这种剥夺不是不可逆的，它取决于我们能否设计和建设一个不是为了流量而是为了时间、不是为了刺激而是为了信任、不是为了发生而是为了维持的公共基础设施。

在认知层面、在技术层面、在制度层面，重构发生与维持之间的因果桥梁——让议题在引爆之后可能存活，让参与在冲动之后可能持续，让信任在碎片之中可能凝结——这是当代公共性重建的不二之径。

参考文献

- Barnard, S. R. (2020). **Temporal multiplicities: Time, media, and the rhythms of digital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Bennett, W. L., & Pfetsch, B. (2018). Rethink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a time of disrupted public spher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8(2), 243-253.
- Fraser, N. (1990). Rethinking the public sphere: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actually existing democracy. **Social Text**, 25/26, 56-80.
- Habermas, J. (1962/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 Burger & F. Lawrence, Tra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Hörning, K. H., Ahrens, D., & Gerhard, A. (1999). Do technologies have time? New practices of tim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Time & Society**, 8(2-3), 293-308.
- Markham, T. (2020). **Digital lif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Pariser, E. (2011). **The filter bubble: 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 New York: Penguin Press.
- Rosa, H. (2005/2013). **Social acceleration: A new theory of modernity** (J. Trejo-Mathys, Tra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unstein, C. R. (2001). **Republic.co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Sunstein, C. R. (2017). **#Republic: Divide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hompson, J. B. (1995).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ucker, J. A., Guess, A., Barberá, P., Vaccari, C., Siegel, A., Sanovich, S., ... & Nyhan, B. (2018). Social media, political polarization, and political disinformation: A review of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Report prepared for the Hewlett Foundation*.
- Tufekci, Z. (2017). *Twitter and tear gas: The power and fragility of networked protes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Wajcman, J. (2015). *Pressed for time: The acceleration of life in digital capitalis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Zaller, J. R. (2021). The crisis of public communication in the age of attention economic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4, 49-68.
- Zerubavel, E. (1981). *Hidden rhythms: Schedules and calendars in social life*.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Andrejevic, M. (2013). *Infoglut: How too much information is changing the way we think and know*. New York: Routledge.
- Bimber, B., & Gil de Zúñiga, H. (2020). The unedited public sphere. *New Media & Society*, 22(4), 700-715.
- Couldry, N., & Mejias, U. A. (2019). *The costs of connection: How data is colonizing human life and appropriating it for capitalis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ean, J. (2005).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Circulation and the foreclosure of politics. *Cultural Politics*, 1(1), 51-74.
- Delli Carpini, M. X., & Keeter, S. (1996). *What Americans know about politics and why it matter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Eliasoph, N. (1998). *Avoiding politics: How Americans produce apathy in everyday lif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erlitz, C., & Helmond, A. (2013). The like economy: Social buttons and the data-intensive web. *New Media & Society*, 15(8), 1348-1365.
- Gurevitch, M., Coleman, S., & Blumler, J. G. (2009). Political communication—Old and new media relationship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25(1), 164-181.
- Hindman, M. (2009). *The myth of digital democra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Honneth, A. (1995/2007). *Disrespect: The normative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theor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Jenkins, H., Ford, S., & Green, J. (2013). *Spreadable media: Creating value and meaning in a networked culture*. New York: NYU Press.
- Jungherr, A., Rivero, G., & Gayo-Avello, D. (2020). *Retooling politics: How digital media are shaping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Klinger, U., & Svensson, J. (2015). The emergence of network media logic i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 theoretical approach. *New Media & Society*, 17(8), 1241-1257.
- Luhmann, N. (1984/1995). *Social systems* (J. Bednarz Jr. & D. Baecker, Tran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rwick, A. E., & boyd, d. (2011). I tweet honestly, I tweet passionately: Twitter users, context collapse, and the imagined audience. *New Media & Society*, 13(1), 114-133.
- Mutz, D. C. (2006). *Hearing the other side: Deliberative versus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Noble, S. U. (2018). *Algorithms of oppression: How search engines reinforce racism*. New York: NYU Press.
- Papacharissi, Z. (2015). *Affective publics: Sentiment,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utnam, R. D. (2000).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Schudson, M. (1998). *The good citizen: A history of American civic life*. New York: Free Press.
- Staab, P. (2022). *The adaptive market: How digital platforms reshape capit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tiegler, B. (2010/2015). *States of shock: Stupidity and knowledge in the 21st century* (D. Ross, Tra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Turkle, S. (2011).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New York: Basic Books.
- van Dijck, J., Poell, T., & de Waal, M. (2018). **The platform society: Public values in a connective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osoughi, S., Roy, D., & Aral, S. (2018). The spread of true and false news online. **Science**, 359(6380), 1146-1151.
- Warner, M. (2002). **Publics and counterpublics**. New York: Zone Books.
- Wu, T. (2016). **The attention merchants: The epic scramble to get inside our heads**. New York: Knopf.
- Young, I. M. (2000). **Inclusion and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